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语丝派”因《语丝》周刊而得名。《语丝》周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10年中产生的重要刊物之一。当年《语丝》旗下聚集了一批声名赫赫的作家和学者,除了当时的文坛巨擘鲁迅、周作人兄弟之外,尚有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孙伏园、章川岛、江绍原、顾颉刚、俞平伯、废名、淦女士等人,他们不仅在现代散文领域创建了杂感和美文的文学范式,在民俗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开拓性成就。

“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意指包括民间的生活习惯在内的所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语丝派”作家之中,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林语堂、孙伏园、江绍原、顾颉刚等人很早就开始了民俗研究活动。

其中,周氏兄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活动的先驱者,早在留日期间便已注目于民俗学研究并开展了零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906年周作人在东京得到英国人类学家安得路朗的“几本关于神话的书”,从此对于神话发生兴趣,并进而对于童话和儿歌产生注意。同一时期,他们还接触到了弗雷泽的《金枝》、葛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哈特兰的《童话的科学》,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等著作,这些著作对周氏兄弟其后的创作和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归国之后,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等书中收入了采自古籍的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和笑话,并大力支持周作人的童谣儿歌研究。1913年12月,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提倡“立国民艺术研究会”,整理、研究各地民间文学,“详其意蕴,辨其特性,又发挥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这份近代史上首次以政府名义颁布的收集民俗资料的文件对“民俗学”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周作人则是投入大量精力开展民俗学研究。1912年,他开始编辑《越中儿歌集》,经精心收集,“共得儿歌二百首左右”,从实践上开启了征集歌谣运动的先河。1913年11月,周作人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发表《童话略论》,首次运用了“民俗学”一词。1922年《歌谣周刊》于北京大学创办,周作人作为发刊词,该刊1923年10月第33、34期重新刊登《儿歌之研究》一文,“民俗学”一词方为大众所知,其后该学术名称便逐渐受到关注,尽管后来有“谣俗学”、“民间学”、“民间文学”等各种学术主张,但最终仍然统一于“民俗学”之称。因此,周氏兄弟可称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民俗学奠基人。在其后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真正开端的北大歌谣征集运动中,刘半农、钱玄同均为重要的主持者,稍后周作人也参与其事。1920年2月,周作人在刘半农留学欧洲后接管歌谣征集处事务,在其后的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活动中成为当时民俗学运动的领导人物。

江绍原是《语丝》周刊的发起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也是中国民俗学的拓荒人之一。与周作人、刘半农倾心于民间歌谣的收集不同,江绍原致力于礼俗和迷信研究。他广泛地收集有

关古代礼仪制度、各地现实风俗及关于头发、唾沫、血液、牙齿等等的迷信和相关行为,将原本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不登大雅之堂的现象引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从细小处着手,发掘出其深层的文化意义。江氏的民俗学研究往往重视原始思维,反对盲目尊古,提倡独立直接地研究古人。他以近代科学的学术眼光和方法积极投身迷信与习俗的研究中,他经常平静地将迷信现象进行集体展示,于不动声色中揭露陋俗的荒诞,于戏谑叙述中显示出科学的理性。他的关于“发、须、爪”的研究和对

应做的事件和考察的7个问题,为方言研究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他的《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被认为是“首创现代的汉语方言学理论”。该文也与沈兼士的三篇论文一起被视为现代汉语方言学形成的标志。

由此可见,“语丝派”作家中,鲁迅、周作人是民俗学运动的先驱;刘半农、钱玄同是民俗学运动发端的主持者和弄潮儿;顾颉刚、江绍原、林语堂为民俗学不同研究方向的拓荒者;其余孙伏园等人亦对民俗学运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语丝》撰稿者

“语丝派”与中国民俗学的兴起

□倪玲颖

国人天癸观的研究获得了学界的推崇。

顾颉刚亦是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对于民俗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所开辟的规范化学术道路和倡导的科学化学术风格。在对吴歌进行搜集和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忠实记录原始材料之外,还对方言进行注音和解释,并附以歌谣与动作的配合说明,他的《吴歌甲集》是中国第一部科学记录的民歌集。而他的吴歌研究又不局限于民歌研究本身,而是从民歌研究再度出发,以证古史,“想借此窥见民歌和儿歌的真相,知道历史上所谓童谣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诗经》上所载的诗篇是否有一部分却为民间流行的徒歌”。他的《写歌杂记》以歌谣来论证前人对《诗经》的误解,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探索,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此外,顾颉刚对孟姜女的故事运用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精神来进行民间文学研究,开中国民俗学界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之先河,使人耳目一新。而他与北大风俗研究会同人的对于妙峰山香会的研究则为中国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调查作业。可以说顾氏的史学家的科学素养和民俗学的崭新视角相辅相成,既使得他的民俗研究和史学研究相得益彰,也为中国民俗学研究设置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语丝派”另一主要撰稿人林语堂时任北大语言学教授,其时正致力于方言新韵的研究,这是民俗学运动的一个分支。1924年1月,出于歌谣收集整理和研究的需要,北大方言调查会成立,林语堂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林语堂就任后于《歌谣》周刊(47)发表具有纲领性的文章——《宣言书》,举出调查会

之一钟敬文深受他们的影响,在其后的研究活动中成为民俗学的领袖人物。可以这样说,“语丝派”作家是中国民俗学运动坚硬的基石和前进的旗帜,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二

由于“语丝派”的灵魂人物醉心于民俗学的研究,《语丝》周刊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民俗学研究活动的阵地之一。自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创刊,《语丝》便与民俗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语丝》上发表的民俗学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民间谣谚谜语的搜集与收录。周作人十分重视民俗学资料的收集,《语丝》收录的民歌有中国的民歌和俗曲,如台静农的《山歌原始之传说》(11,括号内数字为刊期,下同)、散文的《歌王》(23)、凯明的《蛮女的情歌》(26)、黄明的《我所爱的几首歌》(63)等。亦有国外民歌的翻译和介绍,如江绍原的《几首孟加拉的宗教诗》(6)、《又是三首孟加拉的宗教诗》(7)、刘复的《国外民歌译》(28)、《国外民歌二首》(77)、《今希腊的民歌二首》(81)等。谜语方面则有杨荫深的《谈谈村名迷》(62)、负的《再谈村名迷》(73)、刘桂龄的《我也贡献几个地名谜》(96)等。此外,周作人还在《语丝》第48期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呼吁读者帮助收集“猥亵的歌,谜语,成语等”,以“建设起这种猥亵的学术的研究之基”,并希望能通过对这些歌谣的研究找出它们变为情歌,再加纯化而为“美人香草的文词”的痕迹,以期从中“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启事刊出后,投稿者甚多,未及一年便已达到预期数量。

江绍原与《语丝》

□汤志辉

“上午在家。下午往访适之。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这是周作人1924年11月2日的日记。“到市场开成食堂,为伏园办周刊事,夜饭而归。伏园以晨报侵夺文字之权,辞出。拟办一周刊,今日开会。到者有启明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园,及予。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这是同一天顾颉刚的日记,从这两则日记可以看出,酝酿《语丝》诞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在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员上,两者的记载虽有所出入,但二人都记载了江绍原参加了这次聚会。江绍原参与了《语丝》创建的过程,是几个主要发起人之一。

江绍原(1891—1983),祖籍安徽旌德,生于北京一个京官家庭。4岁入家塾,7岁入新式小学,后赴上海先后就读于麦伦书院、浸礼会大学,1914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1915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院。1917至1920年,以旁听生身份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参加“新潮社”,为五四运动学生总代表之一。1920年被选派至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学系学习,1922年又往伊利诺大学研究院专攻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代理主任、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特约编撰员,先后在北京女子大学、中法孔德研究院、中国大学、西北大学等处供职。1949年后曾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主任、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以及商务印书馆编审等职。主要从事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的研究工作,曾在中山大学首开“迷信研究”课程,后又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礼俗迷信之研究”及“宗教史”课程,与钟敬文、李大杰等共同发起成立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发表了许多迷信与民俗方面的研究文章,并出版了《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等学术专著。

1924年11月17日,《语丝》创刊号出版时,江绍原回到北大任教才一年多,时年26岁,既不像胡适回国那样“暴得大名”,也不像周作人那样是显赫的文学大家,他之所以能成为《语丝》创刊的重要参与者,主要是因为他“新潮社”的身份以及与周作人的密切关系。

1919年10月《新潮》出版第2卷第1期时,新增加了16名社员,江绍原是其中之一。新潮社与后来的语丝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与《语丝》创建的成员,除了章川岛之外,其他几位都是新潮社的重要成员。初创时期的《语丝》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它的编辑、校对以及发行都是在新潮社进行,在杂志的地址栏上也写的是“北大一院新潮社”。《新潮》的出版,与《新青年》相互呼应,都是为了反对封建思想,倡导民主科学精神。《语丝》所倡导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和《新潮》的精神亦颇为相契。江绍原作为“新潮社”的重要成员,在当时参与到其他社员一起筹划的《语丝》的创建,也就完全可以想见。

更重要的一点,江绍原作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早在他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时,就与周作人相识,并因为对民俗学与宗教学的共同兴趣,而建立了很好的关系。1926年周作人在《发须爪》一书的序言中回忆他与江绍原的相识过程:“我当绍原在口口大学时就认识他。有一天下课的时候,绍原走来问我日本的什么东西,又领我到图书馆阅览室,找出一本叫做《亚细亚》的英文月报给我看,原来是什么人译的几首Dodoits,日本人用汉字写作‘都都逸’,是近代的一种俗语。我自己是喜欢都都逸的,却未必一定劝别人也去硬读,但是绍原那种探查都都逸的好奇与好事我觉得是很可贵的,可以说这就是所以成就那种研究的原因,否则别人剃胡须,咬指甲,干他什么事,值得这样注意呢。”因探讨学问而结识,江绍原对周作人一直执弟子礼。在后来的《语丝》时期,他们之间的交往通信愈其频繁,江绍原成了苦雨斋的常客。仅1925年至1936年间,周作人致江绍原的信件就达110封之多,江绍原也有大致相近数目的信件。学问上的兴趣相近,再加上

性情的相投,出国之前的江绍原即以与周作人相识,等回国到北大任教后,他们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与周作人的特殊关系,江绍原也就加入了《语丝》创办的行列。

江绍原参与了《语丝》的创办,同时也积极给《语丝》撰稿。据初步统计,在北京版的第一—156期《语丝》中,江绍原共撰文16篇,其中以“小品”为题的系列短文,未重复计算。在众多《语丝》的撰稿人中,发表文章数排第8位。孙伏园在《语丝》正式出版之前曾写过一份“红字白纸约摸四开报纸大小的广告”,广告里说《语丝》杂志“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江绍原在《语丝》创刊初期,就是16位长期撰稿人之一。

《语丝》主要撰稿人在当时经常举行聚餐会,一般是每月1次。在聚餐会上轻松愉快的聊天中,他们可能谈时事,聊文学,论学术,《语丝》上的许多论题和文章就在这随意而谈的过程中产生了。江绍原也是聚餐会的积极参与者,他在《语丝》上所发的《礼部文件》系列文章,还有关于礼俗迷信的《小品》,许多都有讨论的痕迹,即便下笔为文时,也还是讨论的语气,这些带有“草稿”性质的文章,一部分就起源于聚餐会的闲聊。

在语丝创刊1年的时候,孙伏园发表了《语丝的文体》一文,对一年来的《语丝》所显现的文体特征做了说明:“语丝并不是在初出时有若何的规定,非怎样怎样的文体便不登载。不过同人性质相近,四十期来形成一种语丝的文体。”周作人在两周后对孙伏园做了回应,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中说:“我们并不是专为讲笑话而来,也不是来讨论什么文体与主义,我们的目的只在让我们可以随便说话。我们的意见不同,文章也各自不同,所同者只是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说。”

江绍原在《语丝》上发表的文章即体现了《语丝》的这一文体特征,也可以这么说,江绍原参与了《语丝》文体建构的过程,他所发表的文章是形成《语丝》文体的重要部分。周作人在发刊词上对《语丝》所要刊载的文字有个大体的说明:“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于研究,在得到学者的援助时也要发表学术上的重要论文。”这表明《语丝》不仅仅是一份文学刊物,同时还刊登学术文章,以“文学为主,学术为辅”。《语丝》自由活泼的文体,可以说给了江绍原用武之地。1926至1927年间,江绍原在《语丝》上发表了50余篇民俗小品,总题以《小品》或《大家的小品》,每篇又冠以一个小题目,为该文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些小品主要以礼俗、迷信、宗教为讨论的对象,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学理性,但是又与纯粹的学术文章不同。这类学术小品形式灵活自由,长短不一,有时一两百字也可为一则,有时又非几千字才能尽其意。

江绍原以《语丝》为平台,大量搜集民俗材料,很多读者来信,为其提供当地的民俗材料,这为江绍原的小品写作提供了较多的素材。在《语丝》第105期的《小品二十四·寄名》前有小序:“先把特地找来的或偶然见到的事实,随时写在《小品》里发表;正式的方板的论文,待将来再经营。这样做,于我有种种好处;其中有向读者们声明必要的,只在下面的一种,曰:可以多得到些同志的合作。我所收的零碎,如其不断的印出来,必可以触动大家的记忆,引起大家的搜辑采访,可以催大家提笔,更可以使大家因观摩而记忆愈深,采访搜集愈勤,提笔记录愈加高兴。”将小品作为正式论文写作前的准备,用较为活泼的文体展现出来。

很快江绍原就得到了读者的回应。在《语丝》第130期,一位名叫李荆石的读者来信:“《小品》一项,我被它引起的趣味很不少。因为这些事象,是平常惯见而最易忽略的。虽然有时无意间也引起人的注意去研究,或想到古书

应做的事件和考察的7个问题,为方言研究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他的《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被认为是“首创现代的汉语方言学理论”。该文也与沈兼士的三篇论文一起被视为现代汉语方言学形成的标志。

由此可见,“语丝派”作家中,鲁迅、周作人是民俗学运动的先驱;刘半农、钱玄同是民俗学运动发端的主持者和弄潮儿;顾颉刚、江绍原、林语堂为民俗学不同研究方向的拓荒者;其余孙伏园等人亦对民俗学运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语丝》撰稿者

二是民间故事的整理和研究。对于民间文艺的征求一向是《语丝》周刊的重要目标之一,其征稿启事曰:“凡民间流传的故事,如神鬼故事,名人故事,呆女婿故事,及其他一切趣事等,不论已经古人记录与否,皆所欢迎。”(4卷1期)。对于民间故事的记录,周作人在《语丝》第50期为雪林的来信所写的案语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记录故事,有两件事很要注意。一即……在特殊的新的以外,更要搜录普通的近似的以致雷同或近似的故事的。启明《花束序》(4卷3期),潘达仁《关于“睡庙求医”》(4卷8期)等则是关于“睡庙求医”母题的故事。

三是古代礼俗及民间风俗的整理和研究。在这方面,江绍原的成就尤为突出,他与周作人的《礼部文件》系列;《礼的问题》(3)、《女婢心理之研究》(5)、《周官媒氏》(43)是关于中国古代礼俗制度的搜集和整理;而他的百余篇系列民俗“小品”文则主要集中于礼俗迷信的研究,既有江氏自己搜集整理的原始资料,亦有读者提供的各地风俗。与读者的互通往来是江绍原有意为之:“我想引起一些人对于迷信礼俗的兴趣,并且借此请求他们把每人所知道的性质相同或略同的东西写出来供众人研究。”在当时缺乏经费实行田野调查的条件下,这些来自各地的信件汇集了存于野官碑石、乡野之谈的零散民俗资料,实现了类似田野调查的资料搜集,为江绍原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翔实资料。这些短小灵活的民俗小品内容包罗万象,有关于身体与诅咒的风俗,如陈瑞华《结发与占卜》(116)、《别土再谈凌州俗》(116)、刘晓浦《薄饼,外加猪肉和大葱》(109);有关于血液的,如江绍原《元红、红珠》(97);有关于鬼神的如江绍原《鬼神之名》(97),另外有关于成人礼、命名礼等礼俗的文章。此外还有其他作者的作品,如关于婚俗的廖南欧《新娘的装束》(113)等,以及揭露陈规陋习的周作人的《狗抓地毯》(3)等。

由上可见,“语丝派”核心作家或为民俗学运动的首倡者,或是其不遗余力的推动者和拓荒者,他们的身份天然地决定了“语丝派”及《语丝》周刊与民俗学运动的密切关系,他们在民俗学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也必然会影响到《语丝》社的办刊方针和编辑活动。对于民俗学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一以贯之的重视,《语丝》长期进行民间文艺征集活动,加上江绍原、周作人等民俗研究者以及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为《语丝》带来了大量的民俗研究爱好者,客观上促进了民俗学运动的发展,扩大了中国民俗学的影响。在1925年民俗学研究的专门刊物《歌谣》周刊停刊之后,作为第一个以“自由发表”为存在意义的刊物,《语丝》成为民俗学的研究重镇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而《语丝》停刊之后,江绍原向其他刊物投民俗研究小品文稿屡遭拒,则正可作《语丝》之于民俗学运动重要性的反证。

《语丝》周刊,文学馆里多处收藏,唐弢文库、姚雪垠文库、俞平伯文库、王瑶文库、期刊大库都有。几个文库合成一个“完璧”,即第1—156期,第4、5卷各1—52期,总共260期,一期不少。

关于该刊之由来,据说与当时正主政《晨报副刊》的孙伏园有一次发怒有关,而孙的发怒又因鲁迅而起。1924年10月,鲁迅先生把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发排,却在见报的头天晚上,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已从大样上抽掉。孙伏园为此愤而辞职,所以几天以后,当孙伏园提议要自办刊物时,鲁迅便“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那‘刊名’的来源,听说,是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用,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

1924年11月17日,《语丝》问世,周作人代表同人写《发刊词》:“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枯燥,思想界太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暗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旨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在得到学者的援助时也要发表学术上的重要论文。”

说得轻描淡写,干得却轰轰烈烈。刊物本身虽“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但“喜欢涉及现代社会”,“不愿意在有权力的刀下,颂扬他的权威,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却“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语丝》遭逢了太多的事情:1925年的“五卅”运动及同年的北京女师大潮、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全让它给赶上了。赶上了,就不会闭目塞听装聋作哑;赶上了,就必须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上述事件中,《语丝》始终站在思想舆论阵地的前沿,勇敢地担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社会批判责任。

自生命之始到年满3岁,《语丝》一直由孙伏园主编;发行工作则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继由北新书局负责。1927年10月22日,《语丝》遭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北新书局也同时被封。北京既不能立足,遂双双迁至上海。在北京编好的155、156两期《语丝》,仍交由北新书局于同年11月在上海印制发行。1927年12月17日,第4卷第1期《语丝》出版,主编改为鲁迅,刊物也由16开本改为24开本。至1928年年底编完第4卷后,鲁迅推荐柔石接编第5卷。1929年9月,柔石编完第5卷前半卷(1—26期)后交李小峰编辑;1930年3月10日,李小峰编完第5卷后半卷(27—52期)后,《语丝》自行停刊,总第260期成为最后的句号。